

# 百戰功高黃克強（一）

蔣君章

## 與我中華克復強暴

民國初年的風雲人物，我們必首推黃克強先生。這位湘中青年，憑其特異的天資，任俠的性格，在湘中首創革命，組織華興會，密謀起義，事敗，東走日本，歸到革命的陣營，與國父的興中會，江浙的光復會，合組為中國革命同盟總會。自此策劃起義，在廣東、廣西與雲南的邊區，屢次舉義，以寡擊衆，纏鬥不已，因此，黃與之名，震於遐邇，為革命同志公認的軍事天才，清軍聞名喪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起義，親率敢死同志，進撲廣州督署，所向披靡，事雖未成，而黃與之威名更盛。武昌首義之後，清政府起用袁世凱，以其素所精練的北洋大軍，分由馮國璋、段祺瑞率領進攻陽、夏，黃與被推為漢口與漢陽方面的總指揮，鏖戰經月，使武昌危而復安，使東南各省聯軍得從容部署，攻克南京，北洋軍之氣餒，為之大減。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總長及參謀總長，總領師干，捍禦強敵，籌北伐，立兵制，整部隊，安後方，可謂以一身寄民國之安危，以克強先生為民國初年的風雲人

物之首要，誰曰不宜！

黃克強先生本名軫，字杞園，一字廬午，諧音作輩塢、近午、慶午，也是他常用的。他之改名與，字克強，在亡命日本的時候，其取義是：「與我中華，與我民族，克復強暴。」他一生的革命救國行動，完全在這範疇之中，觀其名，審其字，便可以知道他的性格與事業。他的先世，本是中原望族，大約由於中原的混亂時期向南遷徙，至江西落籍，明末始遷湖南，是因為仰慕周敦頤濂溪先生的理學，欲親炙其餘韻。其所居的地區，是長沙附郭的善化縣糧塘。先生的父親筱村公，是湘中的名諸生，生子二人，長叔霞，次即先生。同治十三年，即西元一八七四年，先生誕生。時國父孫中山先生已八歲，蔡元培則已七歲。湘中名人胡元倓已三歲，梁啟超與先生同歲，其他革命黨人如秋瑾、張人傑、陳其美、廖仲凱、于右任、史堅如、胡漢民、趙聲、宋教仁、朱執信、戴傳賢等皆較先生稍小二、三歲不等。（參考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這許多革命志士，都陸續誕生於這數年之間，一如上帝爲了要救中國的特別安排，雲從龍，風從虎，風雲際會，

極一時之盛。民國成立，就是這些革命黨人努力的結果。先生的故居糧塘，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區，那裏有壯闊的波瀾，高聳的喬木，有遠山爲點綴，有清水通舟楫，近處則有市廛，鍾靈毓秀，孕育出這樣一個民族偉人和民國偉人。父親是湘中的名諸生，母親是湘中的名門淑女，地利和人和都是先生成爲名人的重要因素。

先生幼年，就表示出他特有性格，陳維綸的黃興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先生早年，就展開他獨特的行動，在衣、食、住、行方面，注意整潔，處理有條；在鄉黨親戚間，進退有節，聽講聖賢英雄故事，常好問其所以，得到詳細的解答，才肯休止。又好攀山涉水、騎馬弋釣等活動，鄰兒都歡喜和他交遊，當他得到親長的餽贈，必邀約鄰兒共享；倘使自己分享不得，便相視而嬉。」

上述這些特性的表現，有許多都是他五歲時的逸事。不私的個性，可以說是得諸天性，尤其是在運動方面，是先生日後有強健體格的來源之一。

在六歲的那年，筱村公始以論語授先生，並教書法和對句，他的讀作，常能超出指定的範圍，其聰明才智，可謂異乎常兒，這大概就是所謂天才兒童了。如是受教者凡三年，到了九歲，始就讀於馮唐鎮（即糧塘）蕭舉人所設的家塾，受詩經，先生最感興趣。蕭氏家塾距先生家約半里，母親羅太夫人愛之彌深，出入皆親自接送。是年羅太夫人患病，先生侍於榻前，朝夕不離，及羅太夫人卒，先生哀毀逾恆，安葬之後，每至校，必繞道母墓，拜而後去，其至誠的孝思，蓋亦出於天賦。翌年，筱村公繼娶易太夫人，也是湘中著名

的淑女，知書識禮，愛先生如己出，督教甚嚴，先生之學業，因而大進。一日，蕭舉人爲人書聯，把「向陽門第春光早」，誤寫爲「向陽門第春先到」，一時不能書下聯，先生進曰：「何不書積善人家喜事多，」蕭先生稱善，同學們都對先生欽佩不已，其才思敏捷常類此。

光緒十一年，先生年十二歲，改從周翰林家塾就讀，受春秋及楚辭，兼習八股文。先生喜詩詞，獨惡八股文之徒向空架子而無內容。然每有所作，文詞與氣勢，均稱佳構，爲鄉里所重。是年中法之間爲越事而發生戰爭，劉永福、馮子材等屢敗

法陸軍，但其海軍則以詐術獲勝。



開國元勳黃克強（興）遺照

至此與拳擊相結合，遂有俠士之稱。先生本與鄉子弟善，常部勒之，所用之法，暗與兵法相合，至此遂爲羣兒之首領，鄉中匪類，皆凜懼不敢犯。

### 長空萬里無敵豪傑

先生從周翰林就學，先後凡三年，到了十五歲，就讀於嶽麓書院，那是湖南省的最高學府，考課甚嚴。先生在院，初仍以研究詞章爲主，旁及諸經、訓詁、音韻，後改宗義理，兼重輿地與算學。凡有心得，皆錄之於筆記之中。其治理學，除研究宋明學案、語錄外，並斟酌程朱的明德與新民，陳同甫、陳良與葉水心的救世濟時，匡復宋室的意旨，以及王陽明的平亂匡明，顧亭林、黃梨洲的除奸抗清，王船山的明物珥亂，光復漢族江山的民族思想，由此而奠定了基礎。其治詩文，不斤斤於章句與文辭以及唐宋諸家之體制，只注意於風格與性情，故其所作，在樸茂中有汪洋恣肆的氣概，時有沈鬱悲涼之作，並擅雄渾流麗的勝場，而有奮勵前進、規復漢業的意旨。先生時亦旁習諸子爲輔，尤喜老莊與禹墨及兵法刑名，對孫子兵法，注意獨多。他認爲孫子兵法所重的「修道保法」，「因時地制宜」，「上下同欲、可與生死」，都與儒墨諸家相貫通，這真是獨特的心得了。先生認爲：機智權謀，輔以仁愛，調兵遣將，威愛兼施，並不是尋常軍人與文士所能輕易做到的，在這段期間，先生習練書法甚勤，但他與當時風尚的行楷，不甚措意，獨好東晉與北魏的書法，他說：「鄭文公碑，字法真正，篆勢分韻，盡在其中，蘭亭雄健幻化，似乎

一消息，便向周翰林請教戰事經過，他尋根究底的個性，至此復再發生，得到的結果，是對滿清政府的嫌惡與憎恨，是爲先生排滿運動的發端。是年年假期間，先生從瀏陽李永球習鳥家拳，一點就透，突飛猛進，能舉百鈞，本有豪俠性格，

奇怪百出，實歸於中和。」誠的論也，雖作臨摹，但只注意於字法的點、畫、使、轉的形質，而尤注意於性情。有評其書法近蘇軾與董其昌者，先生則謂：東坡之書力弱，弊在瀾漫；香光之書氣怯，弊在凋疏，均由指勁不足。若使指有勁，要效法打拳，出手起脚，極勁力所能至，氣通勁出，便能盡勢傳意。」這是先生諸學相通的一貫看法，其好學深思而能融會貫通，也是表現了他的思想之革命性的發展。在嶽麓書院肄業四年，至十九歲，與廖淡如女士結婚，廖女士與先生同歲，是湘中名諸生廖星舫之女公子，也是名門淑女，生四子、二女，除幼子夭折外，餘皆卓然有成。是年，殆為先生嶽麓書院率業之年，觀乎先生年譜，此年以後，即無嶽麓肄業之記載而可以窺見之。

先生在十八歲曾參加縣考，未能錄取。同往應試者有二人，黎明前進場，即日交卷，先生文稿已成，而其他二人正在搜索枯腸。三篇完成，先生首先出場，二人皆取，而先生獨名落孫山，憾之。二十歲又應考，蓋由親命難違，先生固志不在此也。是科獲中秀才，先生常有詩云：「一第豈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頭親」。又賦少年詠鷹詩云：「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蒼海，高陽騰碧穹」；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這才是先生的志願。光緒二十三年，先生年二十四歲，奉筱村公命，北至漢口，參加秋闈考試。行裝甫卸，忽得筱村公噩耗，先生趕回奔喪，哀毀盡禮，時已中日甲午戰敗，維新黨人大行其道，首領之一的梁啟

超應聘入湘，主講於長沙時務學堂。時務學堂，本由王先謙等創立，本係私塾，至此改為官立，熊希齡為經理，王先謙、黃自元等為學董，梁啟超則任總教習，皆一時人望。蔡鍔、唐才常、范源廉等皆在校受業，造就人才不少。梁氏在湘，創設南學會、湘學報、保衛局，為維新派宣傳不遺餘力，對湘中學風影響甚大。時先生在守制期間，獨不受其影響。服闕，由嶽麓書院保入兩湖書院肄業。院中課程，除經、史、文學外，尚有天文、地理、數學、測量、化學、博物、兵法、史略及兵操等課，而地理一科之任教者為宜都楊守敬、新化鄒代鈞，都是當代的名家。先生在院，篤志向學，尤對地理與兵操最感興趣。他認為不明地理，無以知天下之大勢，不習體操，無以強身有為。當時風氣未開，學生中大多數都不肯脫下長袍，以短裝習操。一二頑劣學生，常故意與教師相頑耍，令其左，故意向右，並相視而笑。有翻皮袍上縛，毛茸茸如跳草裙舞，令人發噁。

但先生則奉命唯敬，動作一如法度，久之便成風氣。故深為山長梁鼎芬所器重。梁本為科場得意人物，見先生遵守規定，而詩、書、詞、文均臻上選，力勸先生致力於翰苑，先生口雖允從，而心勿謂然。先生之記日記，蓋亦始於此時，所作詩詞，亦悉載於日記中。

庚子拳亂時，先生仍在兩湖書院肄業，時北京已陷，慈禧與光緒狼狽出奔。是年七月，唐才常、秦力山等組自立軍，對外以勤王為號召，實謀起事以推翻滿清政府，先生參與其事。自立軍失敗，唐才常死難，先生哭之痛。說者往往以唐

為梁啟超之學生，其勤王討賊的號召，又為康梁所利用，而以唐才常歸諸保皇黨，即章太炎亦以此責之，先生力闢其非。唐等之為革命黨人，經先生之辨而始明。

### 留學日本致力革命

先生在兩湖書院，先後四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卒業，翌年以湖北官費保送至日本留學，入東京宏文學院，攻教育，與先生同時留日的湖北官費生尚有三十人，為湖北留日學生之極盛時期，為革命黨造就不少的人才。胡漢民先生少先生六歲，未幾亦至日留學，與先生同學，兩人志同道合，不久即成密友，且為國父革命運動的左右手。胡先生對先生極為敬佩，嘗謂：「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慮事接物，則慮裏縝密，轉為流輩所弗逮。先生使人，事無大小，輒曰慢慢細細，余耳熟是語，以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從胡先生的觀感中，我們可以理解先生決非勇往直前的粗線條人物。

時先生已決心革命，願從軍事方面對革命有所貢獻，故特於課餘，講求軍略，暇則參觀士官聯隊兵操，每晨必赴神樂坂武術會習騎射，會中規定，凡連中紅心靶六次者，獎以銀牌，先生射無不中，得獎牌滿雁。留日學生本有勵志社的組織，以「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為宗旨，發刊譯學彙編雜誌，專譯歐西民主思想之典籍，對留日學生之政治思想影響甚大。及八國聯軍陷北京，此一組織，逐漸演變為救國組織。救國不能離革命而空談，於是進一步成為革命組織。唐才常自立

軍之役，返國參加者不少。他們脫險返日後，更加傾心於革命。先生傾談革命，也在此時更為熱烈。其時各省留日學生也紛紛發行革命刊物，東京留日學生的革命空氣，至此益為濃厚。會日政府應滿清政府之請，禁止私費學生肄習陸軍，留日學生因與駐日清使發生衝突，吳稚暉被解回國，胡漢民憤而退學，各省留日學生乃組織青年會，以民族主義與破壞主義相號召。先生則與湘籍同學陳天華、楊篤生等發起游學編譯雜誌，一方面翻譯外國名著，灌輸新思想，一方面鼓吹民族革命，收效甚宏。這一組織，後來改組為湖南編譯社，先生曾譯日本教育家山田邦彥所著的學校行政法論，分期刊載，對中國教育啓發甚多。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留日學生在東京舉行元旦團拜，清駐日公使蔡鈞及留學生監督汪大燮均在座。國父預囑馬君武與劉成禺在會中發表演說。馬氏首先登台，闡述排滿革命之必要，言次聲淚俱下；劉成禺繼起發言，力陳救國必需排滿，激昂慷慨，博得滿座的掌聲。留日學生革命情緒之強烈，由此可知。翌年，日俄戰爭以我東北為戰場，留日學生大憤，召集會議，分電南北洋大臣主戰，鈕永建等主張留日學生應組織軍隊，以實力抗俄，當即徵求志願參軍之留日學生，名之曰拒俄義勇隊，凡此諸事的推行，先生都是躬與其事，而且最熱心策動的一分子。鈕永建等同國請願參戰，既被拒於北洋大臣，清政府並下令各省禁止拒俄義勇隊之集合與訓練，清駐日公使也透露日本警察，禁制拒俄義勇隊的活動。留日學生乃改變方針，改組學生軍為軍國民教育會，以

「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為宗旨，其言有云：「祖父世仇則報之，文明大敵則抗拒之，事成為獨立之國民，不成則為獨立之雄鬼」，其志其節，可謂悲壯之至。東京軍國民教育會之推行，先生為重要負責人之一，也是最熱心的推行人員之一。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成立之消息，傳至上海，上海中國教育會立即致賀，並成立軍國民教育分會以響應之。東京軍國民教育會的職員，有教員、事務員、會計員、運動員、執法官等，其運動員即派遣留學生返國推行革命運動之意。先生與陳天華即奉派回湘，任策動革命之任務。先生奉派後，即日啓程，並向劉揆一請示方略。劉揆一建議多與會黨聯絡。他說：

「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採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多可贊歎。比如湖南會黨有戴某者，違犯會規，其頭目馬福益星夜開堂，判處死刑。當……死者將過山路狹險處，死者猶回顧馬福益曰：大哥好走，須防失足落下坑去。馬亦嗚咽應而慰之。由此，可見其不肯枉法與視死如歸，咸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先生聞之，深為感動，並謂：「聞馬君昔遭危難，君曾救濟之，聯絡似較容易，故望君及早歸國，共圖大舉。」先生之虛心與縝密，由此可知。自此，先生放棄了學業，返國從事於實際的行動。時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先生年三十歲。劉揆一允於三個月後，在長沙相會。

### 返湘執教密謀起義

先生返滬，適值湘譚人胡元倬子靖在滬聘請英文教師。胡元倬是光緒二十八年的拔貢生，留學東京宏文學院師範速成班，與先生同學，私交甚篤。胡先回，創辦明德中學，為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學，因須聘英文教師而至滬，至此與先生相晤，堅請返湘相助，先生允之。上海聖彼得教堂會長吳國光並為先生具函介紹長沙聖公會會長黃吉亭，請登冊記名，作為先生策劃革命的掩護。先生又乘在滬的機會，赴泰興訪縣知事湖人龍璋硯仙，商革命籌款事；又赴南京，訪兩江總督魏光燾之三子魏肇文，肇文乃先生之東京同學。他的活動，都是為革命發展留一地步，都是他細心縝密處。

先生返湘經鄂，寓武昌李廉方寓，宣傳革命，不遺餘力。嘗至他的母校兩湖書院，發表演說，闡述滿清的畛域觀念，指斥清廷的愚昧無能，主張推翻滿清政府的專制政體，攜回鄒容所著的「革命軍」與陳天華所著的「猛回頭」四千餘部，分贈武昌軍學各界。宋教仁時肄業於武昌文普通學堂，聽到先生的演說後，深為欽佩，遂相訂交。時武昌清吏聞先生進行革命宣傳，密告於張之洞，張令梁鼎芬拿辦。梁鼎芬奉令後，訝異地說：「不意黃軫亦竟變為革命黨！」梁尚有憐才之意，乃代以驅逐出境，但先生在武昌仍奄留八日，始返長沙。

先生至校，胡元倬即請其在第一期速成師範班，分兩班上課，教師有譚延闓、張繼、王正廷、

蘇玄瑛（即革命詩僧曼殊上人）等，皆一時俊彥，學生則有陳嘉佑、彭國鈞等，日後都是湘省的知名人物。先生又約李書城、吳祿貞來湘，為湘省籌設武備學堂，他自己又兼課於正經學堂。革命志士，雲集長沙，而兩校學生受師長之薰陶，對革命思想，遂多認識，為後日革命幹部者甚多，是為先生快意工作。先生多才多藝，有時教生物圖畫，有時教歷史、體操，教員缺課，文科方面皆先生代之，真是忙得不得亦樂乎。張繼任西洋史教師，他開宗明義，即講法蘭西大革命，都是有為而發，先生和張繼的交誼，自此益密。他們白天的工作，雖如此之多，但晚間則仍舉行秘密會議，策劃發展革命運動，籌備革命起義。一夕，他和張繼在密議之後，擦拭手槍，不愼走火，幾傷及先生，險哉！時先生已剪去髮辮，在校時多穿體操制服，夏日常讀書於樹蔭之下，赤膊坐在塘邊，有目空一切之氣概。出門時則帶偽辮，以掩人耳目，但服裝亦甚隨便，並沒有一般士子的頭巾氣，這真所謂英雄本色了。

先生是在光緒二十九年五月離日返國，六月至明德任教，即與諸同志悉心籌劃，發展革命運動，吸收革命同志，聯絡湘省各路會黨，至是年九月（陰曆）已有相當成就，明德學校就是他活動的中心。十六日是先生三十歲生日，乃以祝賀為名，聚集各地同志，集會於長沙，組織革命團體，初名大成會，既而改稱華興會，與會者有彭淵協、周震麟、張繼、譚人鳳、蘇玄瑛、吳祿貞、陳天華、宋教仁等二十多人，先生被推為會長，對外則用華興公司的名義，設址於南門附近，

以興辦礦業為號召，招股一百萬元作為資本。實際上是以礦業代表革命，以入股代表入會，以發股票代表發會員證，並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為口號，表示了華興會的革命宗旨。其時劉揆一等自日返國，揆一蓋踐九月之約也，革命黨人之重信尚義，此其一例，先生在會中建議說：

「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者為宜：一為顛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之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為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歿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儉安無識之市民，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分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日見發達，市民亦潛濡默化，且同一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團結，惟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我輩引線而後燃。使能聯絡一體，審時度勢，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為聲援，不難取湘省為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是亦以一隅而敵天下，仍難直搗燕幽，驅逐韃虜。故望諸同志對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接之策。」（劉揆一黃興傳記）

從這一建議中，可知先生的革命基地論，以湘省為主，輔以各省之響應，其結合會黨，乃劉

揆一在東京的臨別贈言。華興會成立後，即推派同志，赴湖北、江西、四川、上海等地，一面聯絡，一面籌設革命機關，作為大舉革命之準備。劉揆一之出任醴陵中學監督，旨在聯絡湘東會黨與軍隊；宋教仁從常德中學轉移至武昌文普通學堂，專與武漢方面之革命黨胡英（宗琬）等聯絡，策動武漢的革命運動之發展；譚人鳳在新化中學任職，專任資江地區的會黨與軍學界之聯絡；周震麟以明德學堂教員為掩護，專事長沙一帶文武學堂師生之聯絡；陳天華與姚宏業則至江西遊說，章士釗則至南京與趙聲等聯絡；萬聲洋與楊守仁則至上海，以昌明公司為掩護，與滬上及海外同志聯絡；而張繼與秦毓鑾則在長沙與先生共同負責結合長沙學界，作為革命活動的核心。有方案、有辦法、策劃周密，是先生革命工作的特色。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先生為了與會黨接洽便利，特設同仇會，以符會黨的原來宗旨。馬福益即在同仇會成立後首先與先生聯絡，並策劃起義，是即萍醴起義的張本。馬福益是湖南哥老會中擁有羣衆最多及地域最廣的領袖，時為湖南輪迴山佛祖堂的山長，有衆萬餘，在長沙、衡州、永州三府，勢力甚大。先生乃以手書令萬武、劉道一前往接洽，福益豪情俠氣，見先生書，立即皈依革命。萬武完成任務後，南至廣西，與桂省會黨聯絡。先生得到馬福益皈依革命的報告，乃與劉揆一同至湘潭，服短裝，踏釘鞋，戴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與福益會晤於茶園舖的一個山洞，福益饜以烤山雞，款談至天明而別。先生詩所謂：「結義憑杯酒，驅胡等殺鷄」者便是

。十月初十日起事，即此次會談之結果。從這些經過來看，華興會是知識分子的結合，同仇會是黨分子的結合，其領導人均為先生，又設黃漢會專門負責軍隊之策反與聯絡，可謂三元組織，一元領導。非若武漢方面共進會與文學社，二元組織，二元領導，必待三二九以後，譚人鳳的撮合，始告合作者可比。先生誠具組織之長才。

### 開明清吏翼護脫險

光緒三十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歲正生日，照例，湘省軍政首要，都聚集省垣，祝此所謂萬壽日，這是革命起義的最好機會。上述先生與馬福益決定之起義日，就是那一天。足證先生胸有成竹，不露聲色之二般。爲了得到武漢的響應，先生曾親至武昌，與該方面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聯絡，科學補習所者，由劉靜安主持，是先生在武漢演說以後組成的。會長是呂大森，總幹事為胡瑛，宋教仁、曹亞伯等，都是科學補習所的重要分子。先生歸後，即推曹亞伯爲湘鄂革命組織的聯絡人，當時在長沙三所中學任教師，自此往來於湘鄂之間，倍形忙碌。起義之日既定，曹亞伯專程返鄂，傳達命令，鄂方乃積極籌備，以謀響應。其時軍費需用浩繁，先生乃以祖遺三百石田租的土地出售，以濟急需，鄂方則印軍用票三十萬以充起義後的軍事需要。合以各方捐款，購得長槍五百枝，手槍二百枝，分發各方應用。各方積極準備，大體已告就緒，先生乃作軍隊組織之部署，先生自任大將，劉揆一爲中將，馬福益爲少將。乘瀏陽普集市的牛馬交易大會，舉行馬福益任命的布達式。而江西自強會，亦於此時（八月）派員至湘聯絡，革命聲勢，益爲浩大。

九月間，先生在明德學堂，印刷陳天華所著的「猛回頭」「警世鐘」等宣傳品，被長沙知府所偵悉，湘撫頗欲藉此以傾覆明德學堂，但兵備處總辦俞明頤，學務處總辦張鶴齡，皆與明德教師譚延闓友善，陰祐之，先生乃離明德，創設東文講習所，仍致力於革命工作的地下發展，胡元倓之創辦明德學堂，是開風氣之先，湘紳守舊紳士，反對本力；至此，由王先謙領銜，向湘撫密告胡元倓、周震麟與先生爲湘中革命領導人，將密謀起義。巡撫陸元鼎密令俞明頤：「速即拿問，分別審訊，明正典刑。」譚延闓等密藏先生於龍夷溪（絳瑞）家中，由黃漢之父龍芝生曾任侍郎，爲湘中鉅紳，特函湘撫，盛稱先生之賢。學務總辦張鶴齡亦以身家性命力保，乃得暫息。惟陸元鼎已派巡防營統領趙春廷多方緝捕，其營兵特與會黨聯絡，因盡悉五路起義的情報，派兵圍先生宅。龍家已得緝捕先生的消息，因接連下帖請先生赴宴。九月十六日適爲先生生日，家中設麵爲壽。先生尙欲食麵而後去，其繼太夫人見龍家連下請帖，必有要事，乃促先生即去。先生乘轎甫出大門，而緝捕者至，問其是否黃軫？先生答稱：不是的，乃是訪黃軫的，因是得脫，暫住龍家。譚祖安先生年譜，有下列一段記載：

「是秋，黃克強與，任明德學堂教員，先已設華興公司，祕結同志，密謀革命。時已多傳言，而王葵園先謙攻之尤力。……巡撫陸鼎元密令捕之。張筱浦鶴齡時提學使，山陰俞壽丞明頤時總督練處，二公與公雅故，而俞交尤篤，均以公故，故少緩緩，遂得脫

。」又云：「公題黃公手扎後云：『甲辰，克強先生爲明德學堂教習，密謀革命……事覺，乃匿夷溪家，揚揚若無事，臥讀書不輟，每飯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長沙府中學，夷溪乘與往，盡取納與中以歸。……俞壽丞言，是日故少緩之，使在事者得避，若持之急，皆不得脫云。』

由此，可知先生之得脫，俞壽丞以譚先生之故，緩其行動之所致。三日後，稍弛，乃遷居聖公會，胡元倓、黃吉亭等謀脫險之計。會武昌日知會長胡蘭亭收師至，共謀良策。金乃珠謂上得外國輪船即等於至租界，胡元倓等乃爲訂日輪票，先生則剃去鬚鬚，黃牧師等則喬裝海關辦事人員。於黃昏城門未閉去，安全出城，登輪沉江而下漢口。適有招商局江亨輪下駛，漢口同志爲包房艙一間，堂堂皇皇的離開漢口。其時先生去鬚貌變，無識之者，故與其驟驟藏藏，令人疑竇，不如明明正作富商達官狀，反較安全。離時秋高蟹肥，先生輪泊九江，得數斤，並能大快朵頤，其豪壯之氣常類此。先生離湘時之川資三百銀元，蓋得之於學務總辦張鶴齡，張在案發時召胡元倓，詢情況，胡氏自承參與其事，請縛以邀功，張憤然擊桌曰：「此狗官誰願做，此刻看如何保護他們？」胡乘間告以乏川資事，張遂畀以銀元三百，革命之影響及於開明的清吏，亦革命史之佳話了。長沙案發，連及武漢，黨人皆先避，張之洞圍捕撲空。先生離湘後，各方致先生之函件，皆由在郵局工作之同志收而毀之，故湘中亦無枝連。

（未完）